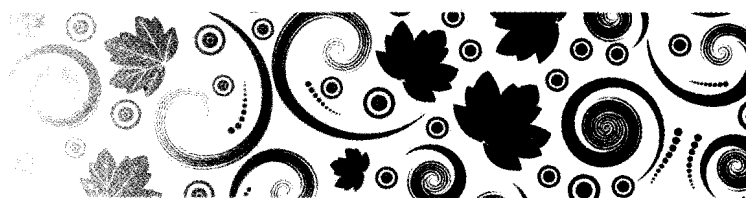


2011 2011 2011 2011

2011 2011 2011 2011 年

中国思想随笔排行榜
古 耜 主编

2011 2011 2011 年中国思想随笔排行榜



古 耜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1年中国思想随笔排行榜 / 古耜主编.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500-0286-9

I. ①2… II. ①古…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7429号

2011年中国思想随笔排行榜

古 耜 主编

责任编辑 姚雪雪 王彦山
美术编辑 方 方
制 作 周璐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22.5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2012年4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字 数 34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286-9
定 价 36.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2-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2011 年中国思想随笔排行榜 2011 2011 2011



目 录

目录

- 铁 凝 山中少年今何在 / 1
- 张承志 亚洲的方向 / 8
- 张 炜 潮流、媒体与我们 / 14
- 王开岭 体制内主流媒体：需要和猎物商量的猎人 / 27
- 张 弘 “中国模式”是与非 / 36
- 陈平原 训练、才情与舞台 / 43
- 格 非 乡村教育：人和事 / 55
- 南 帆 诡异的记忆 / 67
- 许博渊 大文化从小国家崛起 / 75
- 资中筠 当前中国公益事业若干问题之我见 / 79
- 李洁非 谈谈明末 / 89
- 陈众议 民族传统遭遇跨国资本 / 99
- 徐 贲 罪、耻、惧与当今中国的道德困境 / 107
- 雷池月 闲话人性的善与恶 / 125
- 丁 帆 今为辛卯，何为辛亥？ / 137
- 狄 马 美国的法院也“讲政治”？ / 143
- 郭文斌 心灯与明月 / 150
- 李木生 葛底斯堡 / 155



- 张梦阳 深读鲁迅，学会思考 / 167
- 孙 郁 在章太炎的影子 / 178
- 李 辉 另一个邵洵美 / 182
- 王充闾 寒冬早行人 / 192
- 张宏杰 既清又浑的总督曾国藩 / 202
- 李美皆 项羽的青春人格与行为艺术 / 218
- 施京吾 文学与政治 / 233
- 王春瑜 人间若无竹枝词…… / 242
- 张 莉 刹那萧红，永在人间 / 245
- 王开林 隐士与叛徒 / 258
- 祝 勇 我的同事张爱玲 / 276
- 王 龙 苏格拉底与商鞅 / 286
- 王 蒙 秋水的余响 / 299
- 陈思和 看批判电影去 / 303
- 彭 程 阅读的季节 / 310
- 徐怀谦 静默是一种深刻的语言 / 318
- 唐翼明 阅江楼清谈 / 325
- 赵 玫 唯有这光束是永恒的 / 335
- 赵荔红 情未央 / 341
- 张 鸿 事物的种种可能性与道德无关 / 347
- 戴云鹏 阅读长城 / 352

山中少年今何在

——贫富和欲望

铁凝

不久前我看了北京人艺的一出话剧名叫《窝头会馆》，编剧是中国非常优秀的作家刘恒。有人问起作者这出戏的主题，这让刘恒感到发窘，于是他说主题就是一个字：钱。如果“钱”显得直白，换个含蓄一点的说法就是：困境。

正是“困境”这个词打动了，让我想到第二届东亚文学论坛的主题之一：贫富和欲望。这几乎是一个当今人类社会无法回避的大问题，因为有人类就有贫富和欲望，有欲望就有困境。而人作为生物界的高级动物，所面临的困境更为复杂。“外在的困境是资源短缺，内在的困境是欲望不灭。”这也是刘恒的话。

面对一个大的命题，我常常感到自己叙述起来的力不从心。那么，不如就让我从小处开始，从我的一个短篇小说讲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写过一個名叫《意外》的短篇小说，这是迄今为止我最短的小说，1000个字，汉字排版一页半纸。有时候我也会像刘恒那样被朋友问道：你这个小说是写什么的？为了简便，我常用一句话表述，我说这大概是一个关于困境和美的故事。小说大意是这样的：二十年多前中国北方深山里的小村子台儿沟，很少有人家挂照片，因为很少有人出去照相。镇上没有照相馆，去趟县城，跋山涉水来回五百里。谁家要是挂张照片，顿时满屋生

辉，半个村子也会跟着热闹几天。小说主人公山杏的哥哥来信向家里要张“全家福”照片，信中特别提到，最想念妹妹山杏。他在南方一个小岛上当兵已经两年，走的时候山杏才八岁。接到哥哥的信，山杏就催爹妈去县城照相，从春天催到秋天。后来，摘完了核桃、柿子，山杏一家终于决定远征县城去照相。那天晚上山杏一夜没睡好，看妈在灶前弯着腰烙饼，爹替她添柴烧火。他们用半夜的时间准备路上的干粮，如同过年一样。天不亮，他们就换上过年才穿的新罩衣，挎起沉甸甸的干粮篮子出了村。他们搭了五十里汽车，走了二百里山路，喝凉水、住小店，吃了大半篮子干饼，第三天才来到县城。他们找到了照相馆，照相师傅将他们领进摄影间。当满屋灯光哗地一下亮了起来，当高楼大厦、鲜花喷泉之类的他们从未见过的华丽布景把这一家三口人包围时，他们甚至来不及惊叹，照相已经开始。在照相师傅的指挥下，他们努力把自己坐端正，同时大睁着眼睛向前方看去。随着灯光哗地灭掉，这隆重的事件，几乎一瞬间就结束了。半个月后，山杏爹从村委会拿回一个照相馆寄来的信封。山杏抢着撕开封口，里面果然有张照片。但这张照片上没有大睁着眼睛的山杏一家，照片上只有一个人，一个正冲他们全家微笑的好看的卷发姑娘。第二天，山杏家的墙上挂出了这张照片，照片上的姑娘冲所有来参观的人微笑着。有人问起这是谁，爹妈吞吞吐吐不说话，山杏说，那是她未来的新嫂子。

二十多年前我是一家文学杂志的小说编辑，有时候我会在小说《意外》那样的深山农村短暂地生活，或者说“采访”。在一个名叫瓦片的村子里，我在“山杏”的家里住过。那一带太行山风景峻美，交通不便。村子很穷，土地很少，河滩里到处是石头。因为不能耕种小麦，白面就特别珍贵，家里有人生重病时，男主人才会说一句：煮碗挂面吃吧。我却被当成贵客款待。山杏的母亲为我煮挂面，煎过年才舍得吃的封存在小瓦罐里的腊肉。当我临走把饭费留下来时，他们全家吃惊地涨红了脸，好像这是对他们的侮辱。在这个家庭，我见到了被常年的灶烟熏黑的土墙上挂着唯一一张城市年轻女性的照片，就是我在小说里的那一张。有位德国作家说过，变美是痛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那么山杏一家对这陌生照片的态度，就是把困境变成了美吧？还有善良。

二十年之后，小村庄瓦片已是河北省一个著名旅游风景区的一部分了，因为铁路和高速公路铺了过来，一列由北京发车的火车经过瓦片通向更深的深山。火车和汽车终于让更多的外来人发现原来这里有珍禽异兽出没的原始森林，有气势磅礴的百里大峡谷，有清澈明丽的拒马河，从前那些无用的石头们今天也变成了可以欣赏的风景，而风景就是财富的资源。我曾经为了自己一部电影的拍摄再次来到这山里，电影里需要深山农户的院落，我毫不犹豫地向导演推荐了山杏的家。我看见从前的瓦片村民大多开起家庭旅馆，山杏们有的考入度假村做了服务员、导游，有的则成为家庭旅馆的女店主。她们不再会为拍一张照片跑几百里地，旅游景点到处都有照相的生意。她们的眼光从容自信，她们的衣裳干净时尚，她们懂得了价值，也知道谈论信息。当我向她们打听一个更远的名叫“小道”的村子时，山杏们优越地说：“哼，小道呀，知道。他们富不了，他们没信息！”瓦片和周边的村子都富了，在这些富裕起来的村庄里，也就渐渐出现了相互比赛着快速发财的景象，毕竟钱要来得快，日子才有意思。就有了坑骗游客的事情，就有了出售伪劣商品的事情，就有了各种为钱而起的“嚼清”。

那一次导演对我的推荐很满意，山杏家几乎原封不动地成为了电影里女主角的家。制片主任问我场地租金怎么算，我想起从前山杏一家的纯朴，有把握地说，你就随便给吧，他们不会计较。但事情并不似我的预料，当我回到我的城市后，曾很多次在瓦片家中接待的房东——山杏的爹，因为有了汽车、火车、电话，因为有了信息，遥远的山杏爹总是能够快速把我找到并申诉摄制组付他报酬的不合理。比方他说摄制组用墨汁把他的新房的白屋顶刷成了黑色；大灯把院里一棵石榴树烤成了半死；为了剧情需要他们还往河里摔过他的羊，摔了一次又一次，五只羊被摔得十天站不起来……这都是钱啊，可他们都没给钱。我一次次放下手中的写作帮助愤怒的山杏爹向摄制组要钱，心中却时有恼火：要是没有火车呢？一切不是单纯得多吗？交通、通讯和旅游业给瓦片带来了财富，同时也成为一种运载欲望的挑衅的力量。现代化的强大辐射面对封闭的山谷，是有着产生这种力量的资格的，虽然它的挑衅意味是间接的，不像它



所携带的物质那么确凿和体面。并且我始终认为，它带给我们的积极的惊异永远大于其后产生的消极效果。

那么，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在进化着乡村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扮演着催生欲望的角色。商业文明的到来和它“温柔的挑衅”使未经污染的深山农人的品质变得可疑；没有它们的入侵，贫苦的山杏们的思维逻辑将永远是宽厚待人。可我想说，这种看似文明的抵抗其实是含有不道德因素的，有一种与己无关的居高临下的悲悯。贫穷和闭塞的生活里可能诞生纯净的善意，可是贫穷和闭塞并不是文明的代名词。谁有权力不让山杏们利用大山的风景富裕起来呢？谁有权力不许一个乡村老汉跳上火车去找人“投诉”亏待了他的摄制组呢？其实当我在这儿比喻火车是催生欲望的角色时，蒸汽机火车已经从中国全面退役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背影；内燃机车、电气机车也不再新鲜。几年前上海就已经出现标志着国际领先技术的磁悬浮列车。在这个人类集体钟情于速度的时代，那个仿佛不久前还被我们当成工业文明象征的蒸汽机车，转瞬之间就突然成了古董。蒸汽，这种既柔软又强大的物质，这个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启动了近现代文明之旅的动力也就渐渐从领先的位置上消失了。当它的实用功能衰弱之后，它那暖意盎然的怀旧的审美特质才凸现出来。问题是，当今世界，早已先期享受了工业革命那实用功能所带来的诸多物质进步的人们，谁又有权力为了个人今天的审美愉悦，去对那些大山里的山民们说，我们可以富，但你们却不行呢？

我在这时想起一个深山里的少年。上世纪90年代，一个初秋的下午，我在一个名叫小道（向山杏们打听过的小道）的村子里，顺着雨后泥泞的小道走进一户人家，看见在堆着破铁桶和山药干的窗台上靠着一块手绢大的石板，石板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三行字：

太阳升起来了，

太阳落下去了，

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呢？

问过院子的女主人，她告诉我这是她九岁的儿子写的。我又问孩子是否在家，女主人说他割山韭菜去了。那天我很想看看这个九岁的深山少年，因为他那三行字迹歪扭的诗打动了——我认为那是诗。那诗里有一个少年的困境，愿望，他的情怀和尊严，有太阳的起落和他的向好之心。那天我没有等到他回家，但我一直记着石板上那三句诗。今天那个少年早已长大，或许还在小道种地，或许已经读书、进城。假如在新世纪的今天，我把他的诗改动一个字，变成“太阳升起来了，太阳落下去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富呢”，我还会认为这是诗吗？

与其承认这还是诗，不如承认这是合理的欲望。如同16世纪葡萄牙诗人在欢迎他们的商船从海上归来时那直白的诗句：“利润鼓舞着我们扬帆远航……”

“利润”这字眼嵌在诗行中看上去的确令人尴尬，但文学的责任不在于简单奚落“变富”的欲望，因为变富并不意味着一定变坏，而“变好”并不意味着一定和贫穷紧紧相连。文学在其中留神的应该是“困境”。贫穷让人陷入困境，而财富可能让人解脱某些困境，但也有可能让人陷入更大的困境。最近我在一篇讨论当代中国乡村的价值变化的文章中读到，消费经济时代的突然降临让许多没有足够心理准备和文化准备的村民，无暇也无力去做其他可供想象的人生筹划。多挣钱以确立存在地位的欲望压倒了这些，他们被迫卷入人与人之间一场财富竞赛的长征：争盖高楼，喜事大办，丧事喜办，以丧失尊严来换取以为的“面子”。中国中央电视台曾经报道过南方一些农村，有人在办丧事时请戏班子跳脱衣舞，因为花得起钱而在邻里间“挣足了面子”。这让人瞠目，让人想到说的虽是村民但又何止村民？我的一位北京亲戚，当年住在四合院一间三平方米的小屋里，如今他在为自己选购汽车时，打开一款已属高档车的车门，竟皱着眉头不满地连声说，“后排座空间太小，空间太小！”所有这些，更让人思考一个国家在富强崛起时，文明在何处以何种面目支撑。文明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制度性守护，是对人性尊严所必须的自由平等的捍卫。这也

正是其价值魅力所在。

生活在前进，高科技日新月异。人类的物质文明在过去200多年里发生的变化远远超过了之前的5000年。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相对于人类有文明史的5000年，200多年的时间还是太短了些。更何况，若从非洲南方古猿走出森林开始，人类生理和心理的进化至少已经历了500万年。有人类学家称，几乎所有人都对蛇有与生俱来的恐惧，源于人类祖先早年在丛林中生活，无数代人与蛇共处，很多人失去生命，因此已把这种警觉融入人类的基因代代遗传。当200多年的进步使人类仿佛已经成为这个星球唯一主宰的时候，我们是否真正知道欲望将把自己带往何方？我们是否真正明白自己造成的这所有变化的结果和含义？人类恐怕还要有更漫长的时间去领悟，以让灵魂跟上变化的脚步。今天，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不断加深，我们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我们的物质要求也一再地扩大，虽然我愿意赞美高科技带给人类所有的进步和财富，但我还是要说，以财富和物质积累为核心诉求的变革，不能仅仅成为一种去伦理、去道德、去乌托邦的世俗性技术改革。巨大的物质力量最终并不是我们生存的全部依据，它从来都该是更大精神力量的预示和陪衬。这两种力量会长久地纠缠在一起，互相依存难解难分。它们彼此对立又相互渗透，构成了我们内在的思想紧张。而文学要探究的领域，也应该包括这种紧张。

为什么我常会心疼和怀念瓦片村的山杏和她的一家？为什么处在信息时代的我们，还是那么爱看电影里慢跑的火车上发生的那些缠绵或者惊险？我不认为这仅仅是怀旧，我想说，当我们渴望精神发展的速度和心灵成长的速度能够跟上科学发明和财富积累的速度，有时候我们必须有放慢脚步回望从前的勇气，有屏住呼吸回望心灵的能力。就这个角度来说，文学最深层的意义和精神可能是保守的——即使以最先锋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文学。保守或许对科技创新有害，但在善与恶，怜悯与同情，爱与恨、尊严与幸福……这些概念中，并不存在进步与保守的问题。因为永恒的道德真理不会衰老，而保卫和守望人类精神的高贵，保卫和守望我们共同生存的这个星球的清洁与和平理应是文学的本意。在人类的欲望不断被爆炸的信息挑起、人类的神经频频被信息蹂躏的物欲

时代的喧嚣中，文学理应发出它可能显得别扭的、困难而保守的声音，或许它的“不合时宜”将是真正意义上的先锋！也因此，文学将总是与人类的困境同行。也因此，文学才有可能彰显出独属于自己的价值魅力。

太阳升起来了，
太阳落下去了，
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呢！

我还是记起了深山少年写在石板上这简单的句子，因为这里有诚实的内心困境，有稚嫩的尊严，更有对“我”的拷问和期待。“我”是充满欲望和希望的少年，少年是人类世界的未来。

人什么时候、怎样才能变得更好呢？！

选自《江南》2011年第3期



亚洲的方向

张承志

A

谈起日本总有说不完的话。

但若幻想用理论的方法把话说清楚，往往又只是徒劳。

日本的问题千头万绪，大幅简化，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投身亚洲还是背叛亚洲。

但是话未出口，似乎就听见了中国人惯用的反唇相讥：少来这一套！亚洲怎么啦？我们就是亚洲！

宛似多年前我笨口拙舌，想强调“人民”的意味时的遭遇一样：人民怎么啦？我们就是人民！……于是在那个所谓思想解放的时期，我们无法讨论人民与底层的立场，与特权阶层的挫折并不相同。

言及日本，莫谈理论，还是讲个真实的故事。

1972年脱离日本辗转抵达阿拉伯地区，决心投身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一小批日本青年——他们为自己命名为阿拉伯赤军——加入了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PFLP）的战斗序列，首先接受游击战训练。在贝鲁特的海中进行游泳训练时，不幸发生了一人溺水而死的事故，他的战友桧森孝雄为护送遗骨回到了日本，未能参加以后的军事行动。

当时25岁的学生桧森孝雄，从那一天开始了他孤胆的抗议活动。一直到54岁辞世，他持续了30年之久的对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支持：绝食抗议、游行静坐、宣传救援，最后选择54岁那年3月30日即“巴勒斯坦土地日”这一天，在东京日比谷公园的海鸥广场烧身自杀。

在留下的遗书中他这样写道：

我感到，为解放而组织起来的巴勒斯坦的人们，是我近处的友人。日本正在急于增强侵略战争的体制、变成非常危险的国家。但是，追究侵略战争责任谋求日本解放的人在亚洲并不少见，我也一直希望加入到解放的一部分之中。高度发达的科学的世界，却带来了比古代残酷得多的侵略与屠杀的时代。作为人最真实的、彼此开怀和分担痛苦之心，正被残忍地践踏蹂躏。

对以色列及其后台美国、还有充当他们盟友的日本进行的抗议，虽规模小但在日本持续着。我也要参加其中，成为这抗议的一员。

《水平线的彼岸》，东京风尘社2005年

去年（2010）岁末，我带着女儿，站在了海鸥广场。

一位白发蓬乱的桧森孝雄的昔日战友，声音哽咽地给我们讲解，指点着烧身抗议的位置和细节。确定位置的地标，是一棵从香川县移植的橄榄树。

原来，桧森孝雄就背靠着这株树，如依偎着他献身的巴勒斯坦。在东京湾吹来的夜风中，他的战友告诉我，遗体烧成了焦炭，但只有前胸一小块皮肤未烧。后来在检察遗体时人们才发现：桧森孝雄是把一面巴勒斯坦国旗贴肉缠在身上以后才来到海鸥广场的。那一天他扑倒后，只有胸前的一块皮肤和



旗子碎片一起留了下来，如留下了一个尚未解读的日本精神，以及他以命相谏的——日本的方向。

我以为，那也是中国的方向。

B

明治的时代，孕育了诸多日本的“志士”。值得重新俯瞰他们思想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不仅仅主导了那以后日本的走向，甚至以变种的形式，潜在地影响着今日的中国。

如长州藩的吉田松阴，因思想激进触犯法度而被捕，囚禁中写下启蒙的《狱是帐》。但是他的发愤之作，却一面教导对俄美列强的恭敬、一面宣言对中朝邻国的野蛮：

既与鲁西亚或亚墨利加一旦缔约，决不可因我破约而失信
与戎狄……滋养国力，使易攻取之鲜满支那顺从……得失之壑
乃至土地，可就鲜满夺以填偿之。

影响更大的是福泽谕吉的文明论。福泽谕吉思想的核心要义，就是成为帝国并实现殖民主义、吞噬弱小亚洲的“穷亲戚”。

为今日谋……不可犹豫于邻邦……毋宁脱离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其与支那朝鲜交际之法……径以西洋人待此之风予以处理可也。

脱亚入欧，成了一个古怪的谜讖。日本至今对它再三吟味而不得结论。但是中国朝鲜却一直催促逼迫，警告它只要不放弃脱亚入欧的方向，就得不到亚洲的信任，就永远都是“加快复活军国主义和狼子野心不死。”

也许今日的中国，正朝着明治日本的老路举步。今日重提阿拉伯赤军孙大圣，只缘脱亚入欧的妖雾又重来。

批判只有在矛头敢于对准自己时才称得起批判——如我们对待日本，解

剖的手术刀必须对准大中华的天朝帝国思想。已经应该指出：在今日的中国，至少在一个个精英的圈子，在他们的忧国宏论之中，游走着、甚至疯狂泛滥着一丝与脱亚入欧的明治日本相似的声音腔调。

在今日繁衍的精英里，在天下已任的“士”中，方兴未艾的大国主义和对亚洲弱小民族的歧视，正如一种致命的癌，于无声处，悄无声息，向着中华天朝的眼、目、耳、鼻、骨骼、髓液乃至心眼大脑——危险地传染。

举例则纸短角多，若一言以蔽之，必须说：

如何对待亚洲“还没富起来”的弱小国家，如何对待自己地盘之内“非我族类”的人民——才是中国人特别是精英们在大搞南水北调、重划省区、低碳环保、亚丁护航、海岛争端等大功伟业之前，先要从零学起的头等大事。

黄晓京书中最耐人寻味的部分，也许是关于天下国家与西方式民族国家的分析。他说：“天下国家观，也有人称之为文明国家观，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这也许是亚洲的文化革命的历史含意。”

这一思路源自顾炎武的思想。顾炎武预言般地、最早区别了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

易性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贵焉。

这简直是一篇摒除狭隘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宣言！但是，既然远见卓识被放逐于书卷而不得实施，时至如今就变做了不祥的谶语。恐怕，“亚洲的文化革命”到了它以一出汹汹的历史活剧上演之际，伴随着的，也许将是恐怖的流血，与无边的遗恨。